

百卷本《中国全史》总序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与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极富特色的文化精神。

文化传统，是历史的投影和积淀，是支持一个民族心理活动的潜流。要科学地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就必须展现其文化品格和独特的文化精神；而这种展现，又必须建立在对所有的历史素材进行整体性研究上，而这正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可以说，这也正是我们主编这部《中国全史》的初衷，亦是我们定名一个“全”字而未按习惯定名为中国通史的原由。我们认为，只有“全”才能包含“通”。

我们在设计《中国全史》之时，首先尽力将目光投射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表现上，以大文化的观点来思考历史文化现象，从而探寻其特点与规律。我们希望该书对中国史的描述，既体现树木，又展现森林，并突出中国历史的文化品位。从而在《中国全史》的构架上，我们划分了十个断代和十个专业。十个断代为：远古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国；十个专业为：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宗教、习俗、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如此前后勾联，纵横交错，条块结合，衍成百卷，并凝结为一整体，力图包容、覆盖中国历史的巨大时空，勾画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全貌。这是一项前人所未做过的工作，因而对我们而言，也只能说是一

个大胆的尝试。我们将努力前行 并恭听世人评说 希冀由此探索出一条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路子。

五千年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具有独立于世、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

大陆 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环境基础 农业 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经济基础；儒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基础。因而 中国的传统文化 表现出浓烈的大陆文化、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西方历史文化主要沿地中海周边发展 重商重战 本性开放 喜欢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大陆为基础，她的品格是内向的。

中国大陆的特点，一是面积巨大，二是边缘环境恶劣。她东面是大海 西面是戈壁 南面为群山 北面是草原。比较起来 唯北面尚可发展 但又有游牧民族。于是自春秋始 便在中原北部修筑长城 以至绵延万里 使中原文化成为四面严防的独特文化。

上述特点 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墙”文化特征。

中国人喜欢墙 国家筑有长城 私宅修有院墙。真可谓无墙不成国家 无墙不成城镇 无墙不成家园。只不过各种墙的规格不同罢了。

然而 中国的墙文化并不等于一味主张封闭。确切地说 是对外封闭 而对内开放。这和西方不一样 西方人的墙少 对外是开放的 但住宅内部却是封闭的 即使父母要进孩子的房间 也需要得到允许 否则便是失礼。中国的宅院虽对外封闭 其内部却到处有游廊窗阁相辖。那些

做家长的，有权取消一切人等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如同《红楼梦》中史太君那样的家长。

在人神关系的表现上，西方基督教文化承认上帝的绝对权威，认为人类是上帝的奴仆，人类成员不分贵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往往不是神灵，而是皇帝。如隋唐时代，三教并兴，唐太宗做皇帝，便以皇帝的身份给儒、道、佛排座次。因为本皇帝姓李，道教的创始人也姓李，因而就把道教排在第一位，所谓一道二儒三佛。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帝，道教便也失宠，于是重新给儒、道、佛排座次，认为佛第一，儒第二，道第三。这样的做法，在基督教文化那里是不可思议的，皇帝亦是凡人，凡人怎么能给宗教崇拜的神明排座次？其实，他们殊不知更有甚者，中国皇帝不但可以给神仙排座次，还具有为凡人灵魂授爵的爱好。皇帝尊重孔夫子，就可以敕封他为大成至圣先师，皇帝喜欢关云长，就可以敕封他为荡魔大帝。不但如此，连天堂地狱中的事情，皇帝也可以管得。京剧中有一出传统戏《铡判官》，讲地府中的判官行私枉法，包青天便去地府判断冤情。结果惹怒了阎君。阎君说：“阴间事不用你阳官来管？”但包老爷更加理直气壮，声言：“宋天子他封我阴阳二官！”于是，阎君没了脾气。

正因为中国古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中国老百姓进寺院烧香，就和传统的西方基督教徒进教堂的含义不一样了。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原罪，进教堂的目的是去忏悔自己的行为。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忏悔，在更多的情况下，好像在和神明做生

意。花几个钱 烧一柱香 便希望合家平安 便祈祷有美好的前程，或生个大胖儿子，或找一门好婚事，或生意兴隆 日日发财。中国人似乎比神灵更精明：一方面，学习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一方面亦希望鬼神能为己服务。

古代中国的皇权是高于一切的，但皇帝亦不能长命百岁。皇帝死了，便要根据其一生表现给一个庙号。刘邦创立天下 便称高祖。刘恒、刘启做皇帝时天下大治 便称文帝、景帝。刘彻八次出兵 将匈奴逐出漠北 死后便尊为武帝。杨广昏庸暴虐，死于臣子之手，便称炀帝。此外还有哀帝、献帝、少帝、恭帝之类 都是不祥之兆。这样看来，皇权虽大，但冥冥中还有一个高于皇权的力量。这个力量 就是“道”。开明的皇帝 便是有道 否则即是无道。中国文化中的“道”不但可以“管”皇帝 而且可以“管”世间万物 也“管”天上的神仙和地下的鬼魂。以“道”衡量 中国的一切神仙都有缺点，故而狐鬼神仙世界便也有了善恶。恶神善鬼，是中国人智慧的表现，所以中国的许多妖狐鬼魅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像《聊斋志异》中那许多美丽、善良的鬼狐，谁不喜欢？

中国古人的“道”无所不在 无时不在。它近乎现代人观念中的普遍性规律。不过不是能用简洁的语言概括的规律 唯其如此 老子才说：“道可道 非常道。”

中国古人重视“道”的影响，讲究天理、天命、天道、天运 又讲天时、地利、人和，主张天人合一。无论天上地下，还是世间万物，都被统一的力量所左右，而这力量正与人间的伦理纲常相合。

中国古人不但讲天人合一，而且相信天人感应。统治

者作了坏事 会天怒人怨 做了好事 等于顺应天理 会得到上天与人世的共同支持。所以《易经》上说：“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要人们去恶扬善，自强不息。

中国文化传统，最重视人生，也最热爱人生，强调“食、色 性也”。认定吃饭是第一位的，生儿育女是顶重要的。一是珍视生命 贵生恶死 二是重视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因为重视生命，所以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道教，就有了与其它一般宗教绝然不同的文化品格。大抵宗教的特点是研究人死后怎样，而道教则一心关注人怎能不死？因为重视传宗接代，所以对孔夫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才抱有宗教般的感情。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一切身外之物都可以不要，唯独不能没有子嗣。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热爱生活、勇于生活并善于生活的民族。这表现在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上。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民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美食美味的民族；既是一个勇于与恶劣环境作斗争的民族，又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环境以求生存的民族。所以中国的饮食，曾经独领风骚于世界。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亦能顽强生存，自给自足。

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使民族和睦成为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主旋律。历史上虽有多次民族冲突，但终究归于一体。

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在人生信仰方面，主张宗教宽容。虽然也曾有过宗教冲突，但总体而言，不同的信仰可以和睦相处，甚至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历史上最值

得骄傲的盛唐文化，就是儒、道、佛三家文化共存共融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其中任何一家的努力，都不会有伟大的盛唐文明。

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使中国文学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中国古人善于师法自然、造化天功、抒情写意，不失天然本色。比如中国的古建筑艺术，最擅长借天然景色，变天上景为人间景，使二者相互融为一体，更见光辉。如北京旧时“燕京八景”之一的“芦沟晓月”就深得个中三昧。月亮本是自然景观，建筑师却使它与芦沟桥发生关联，桥因月而生辉，月因桥而增色。这便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和设计方式，而这种方式对于现代人类保护和利用环境，仍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些特点，使中国文化更具兼容性、整体性、现实性和模糊性。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古代中国人不喜欢天人分裂的极端行为，更喜欢儒家学说中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热爱故土，重视乡土人情。虽远游千里，终不忘落叶归根。有人说中国人最看重种族血缘关系，其实不然。和日本民族相比，中国人更重视“土地”，日本才是最重视血缘关系的民族。所以异族人在日本生活，即使住上一百年，仍然不能同化到日本民族中去。西方人又不同，他们最重功利，利之所在，即义之所在。所以离乡背井，寻找新的生活环境，并不是特别难堪的事。中国人是最重视乡土关系的，只要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便是老乡，而“老乡见老乡”便要“两眼泪汪汪”。旧诗中写人生

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其中第二件说的就是乡土情谊。

但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重视亲情关系，而且也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中国是一个最富人情味的国家。中国人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重礼仪、重道德、重伦常、爱面子，凡此种种，使得中国人对人生具有一种充满善意的态度和美好的希望。“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也应该看到，古代中国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却是一个历史极为漫长的等级制国家。人分九等，尊卑有序。官民界线分明，奴才都分大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人生倾斜，观念僵化。

在官场上，宰相虽大，但皇权更大。正如明朝设有廷杖，即使身为宰相，一旦触怒皇帝，也马上拖下去痛打。知县在秦代还是重要的官吏，但后来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县官地位亦日见卑下，所谓七品县令，不过芝麻小官。他们面对皇权，形如蚂蚁，但转脸而对百姓，便成了大象——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虽然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依然属于官本位类型，这是中国自宋元以降，慢慢而至大大地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的一位学者比较中、日文化，说中国文化是“至尊”与“至强”合一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至尊”与“至强”分离的文化。日本历史上的至尊者，唯有天皇，所以除非皇族嫡亲，没有人对天皇的宝座存在幻想。但至强者却未

必是天皇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天皇固然至尊 幕府才是至强 所以日本人的文化性格 就有了两重性：一方面不作至尊的梦想，一方面又有无比强烈的自强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至尊者 是皇帝 至强者 也是皇帝。其流势在于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智慧固然绝不弱于他人 但人格很难完整 在皇权与官僚面前 往往不知不觉，便矮下去三尺。

中国文化传统 又是一种重农抑商、重“仕”轻技的文化类型。一方面轻视和歧视商人，一方面又轻视和藐视科技。所以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在世界近代科学史上的发明创造者中 却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字。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虽然早于哥伦布，却没有取得哥伦布那样的历史性成绩。此无他 因为郑和后面缺少近代商业作后盾 也缺少近代文明的有力支持。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在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 而且自我中心观念严重。总认为别人有的 我们中国全有 不但全有 而且比人家的资格更老。这种盲目的老大思想 往往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缺乏正确认识。日本人总有危机感，中国人却最少危机感。很多情况下 明明已经发生危机 还以为天下无事不乐 只管高枕无忧。

公平地讲 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 在宏观意义上考虑并没有优劣之分 而在阶段意义上讲 却有优劣之别。中国自 15 世纪以后 与西方文明拉开距离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实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

兴衰史。中国虽然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历史文明古国，但没有断层，不等于没有兴衰荣辱。中华民族虽然曾领风骚于世界，但也曾成为让别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

反思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开放时期，便是兴旺时期；凡封闭时期，则是已经衰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楚人可以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唐代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唐前经过数百年兴衰动乱，使得唐王朝具有博大的历史胸襟。唐时文化兴旺，对儒文化、道文化、佛文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均采取宽容的态度。所谓唐人有胡气，正说明了唐人勇于开放，唐人有胡气，才显示了唐文化博大瑰丽的历史风貌。

中国自15世纪始，落后于西方。此后一去三百年，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鸦片战争，才使得中华民族从历史文化迷梦中惊醒起来。

积中华民族数千年之经验，积中国历史数百年之教训：唯有开放的中国才有光明的前程！

自然，开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举措。与其说国家的开放是一项政策，不如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文化工程。国家的开放，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文化教育和经济战略相配合，要讲究科学与文明，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未来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要造就一代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中国人。

一要开放 二要科学 三要文明 这正是中国历史兴

盛发达的原因所在。

现代中国人之所以要反思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就是要正确评价别人和自己，从而找出正确的发展道路，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赶上世界潮流成为先进国家。

李约瑟说过：“当东西方科技接触时，会达到一个互相融为一体的时机。”但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机。

我们认为，当世界各民族文化终于融为一体的时候，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历史机遇和空前盛大的历史性节日。

为了迎接这个历史机遇和节日的到来，我们结合上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在学术界老前辈的热心指导与关怀下，在人民出版社上下一致的鼎力和协助下，与数百位学术界精英倾心合作，主编了这套大型《中国全史》。欲以新目光省视华夏五千载凝重之历史，以新观念反思中华五千载古老之文明，并将此书作为一份心意，奉献在每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同胞与友人面前。

史仲文 胡晓林

1993年12月25日于北京莲花河畔

為百老不中國全史題

百年盛事

張氏山年

一九九一年

百卷本中國全文

取精用宏

季夏林

百卷本《中国全史》 编辑工作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名誉主编：张岱年 季羨林
总策划：胡晓林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主任：王书良

专家团：

马学良	王柯敬	王相钦	王梓坤	王钟翰	仇春霖
宁可	吕齐	吕大吉	朱大渭	朱德生	刘和
刘重日	齐世荣	汤一介	牟钟鉴	杨辛	李学勤
何兹全	宋蜀华	启功	张传玺	张显清	张岱年
陈高华	林甘泉	林志浩	林耀华	罗安源	周一良
季羨林	庞朴	哈经雄	钟敬文	贺名仑	徐迺翔
黄烈	龚书铎	董久昌	路志正	戴逸	

编委：

丁双平	马洪路	王宇信	毛佩琦	石椿年	成常福
朱大渭	刘士文	刘秀生	李尚英	杨生民	佟鑫
张践	张健	张才彬	张占国	武金铭	岳斌
岳庆平	周湘斌	庞毅	金泽	顾建华	涂四祥
梁满仓	谢宝成	颜品忠	颜吾芑		

百卷本《中国全史》各断代分卷主编

远古暨三代：	马洪路	张才彬	成常福
春秋战国：	王宇信	杨生民	岳斌
秦汉：	颜品忠	岳庆平	颜吾芑
魏晋南北朝：	朱大渭	梁满仓	
隋唐五代：	谢保成	武金铭	刘士文
宋辽金夏：	张践	周湘斌	张健
元代：	佟德富	顾建华	
明代：	毛佩琦	金泽	何长华
清代：	刘秀生	庞毅	李尚英
民国：	徐迺翔	张占国	

一、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张鲁在汉中、巴蜀传播的天师道仍在传播。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张鲁在汉中就以五斗米道组织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安中，曹操夺取汉中，将张鲁及其部分教民北迁，天师道因而在北方传播。但张鲁到北方后不久即去世，天师道因而组织涣散。在巴蜀的天师道也因无领导组织同样涣散。

成汉李氏据蜀后，因其信奉天师道，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

魏晋间北方战乱频繁，灾荒不断，人民群众便流入江南或巴蜀，而巴蜀民众也因此又流入江南。于是北方的太平道和巴蜀的五斗米道也传到江南。江南就出现了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这些道派都广泛在民间传播，后来还多次出现李弘起义与孙恩、卢循起义。

传入江南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向上层发展。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的士族就明显增多，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义兴周氏等等 都有信奉天师道的。

东晋初，葛洪对以前的神仙思想作了总结，确立了神仙道教

理论体系，并发展了金丹派的炼丹术。葛洪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而修道最主要的方法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故葛洪特重炼丹，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化学资料。葛洪的著作很多，现存而又最重要的是《抱朴子》。

东晋中叶以后，江南天师道盛行，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上清经》和《灵宝经》就是其中的两类。《上清经》是杨羲许谧所造以后便发展为上清派。《灵宝经》是葛巢甫所造以后发展为灵宝派。

南朝初期，陆修静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并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分类整理了道教典籍，为道教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南朝中期的陶弘景，在隐居茅山的45年中广招徒众弘传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后世因称之为茅山宗。陶弘景除弘传上清经法外，还建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陶弘景的著作很多，方面也广，主要的有《真诰》、《登真隐诀》、《养生延命录》等等。

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对天师道作了改革，改革的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以封建礼法制度为准则凡符合的就保留和增加，不符合的就革除。经此改革后，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了统治者所用的官方道教。但是，北魏道教的发展终不如佛教，加之寇谦之之后又没有杰出的弘教者，新天师道便在魏末衰落了。北齐甚至不承认道教，北方道教只有北周关中地区兴起的楼观道在发展，并成了后世隋唐最兴盛的道派。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

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 40 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 84 部 188 卷。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

民族 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 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 所应兼奉，”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 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 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 在夺取东晋襄阳后 迎得高僧道安。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 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 坚持每年宣讲两遍 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 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著作。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 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在长安的最大一项佛事活动是组织译经。他在长安整 6 年中 直接主持译出佛经 14 部 183 卷。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 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 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教学者 更是弘传佛教的大师。他徒众甚多 并主张“教化之体 宜令广布” 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 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 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 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 在他即位后 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 竟派兵西伐后凉。鸠摩罗什至长安后 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 甚见优宠”。

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 鸠摩罗什在长安的 11 年中 译出大量佛经 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 现存尚有 39 部 313 卷。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 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